

# 从孔孟“仁者爱人”到朱熹 “仁者 爱之理 心之德”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对于孔子讲“仁”朱熹发挥孟子所言“仁,人心也”,认为“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相对于今天对孔子“仁”的解读,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将二者分别开来,朱熹把“仁”界定为“爱之理,心之德”,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孔子;孟子;朱熹;仁;爱之理;心之德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8)04-0005-10

DOI:10.13764/j.cnki.ncds.2018.04.001

《论语》讲“仁”甚多,但孔子并没有直接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据《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则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后,“仁者爱人”一说广为流传。蔡元培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指出“孔子尝曰‘仁者爱人,知者知人。’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分心意为知识、感情、意志三方面,而以知仁勇名其德者。而平日所言之仁,则即以为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sup>[1][P111]</sup>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仁者人也’,只是说仁是理想的人道,做一个人须要能尽人道。能尽人道,即是仁。……蔡子民《中国伦理学史》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这话甚是。”<sup>[2][P99]</sup>冯友兰于

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依据《论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指出“仁以同情心为本,故爱人为仁也。……故仁为人之性情之真的,而又须为合礼的流露也。”<sup>[3][P315-316]</sup>因而也赞同蔡元培的观点,说“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sup>[3][P318]</sup>冯友兰晚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仍然说“孔丘往往把‘仁’作为人的完全人格的代名词,有完全人格的人,他称为‘仁人’。”<sup>[4][P145]</sup>

与这种以“全德”或“人道”“人格”界定“仁”不同,还有学者以人的内在心性言“仁”。熊十力注《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说“仁者,本心之名。本心兼具生生、刚健、昭明、通畅诸德,总括而称之曰仁德,故本心亦名为仁。终食者,一饭之顷。仁心,吾身之主也。”<sup>[5][P209]</sup>马一浮在《论语大义》中说“仁是心之全德,《易》言之亦曰德之总相,

收稿日期:2018-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

作者简介:乐爱国(1955-),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宋明理学、朱子学研究。

即此实理之显现于发动处者。……仁是性德,道是行仁,学是知仁。”<sup>[6](P161)</sup>

一是从外在的道德界定“仁”,一是从内在的心性言“仁”;这种分歧,实际上自孟子以来就一直存在,正如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所说“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sup>[7](P7)</sup>

## 一 汉唐诸儒论“仁”

孟子不仅讲“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而且还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以为仁是人道。同时,孟子还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以为仁在于人心。荀子对“仁者爱人”做了解释,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荀子·议兵》)据《荀子·子道》载,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可见,荀子所谓“仁者爱人”,包含了“仁者自爱”。

汉唐诸儒继承先秦儒家,对“仁者爱人”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仁本原于天,为心所固有。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仁的本原做了阐述,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sup>[8](P183)</sup>董仲舒认为,仁本于天,天之仁在于“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因此,人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应当效法天之仁而爱人。他还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

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sup>[8](P91)</sup>韩婴也认为,仁为天之所生。他说“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sup>[9](P80)</sup>此外,韩婴又讲“仁义根于心”<sup>[9](P72)</sup>。后来,郑玄也说过“人之心皆有仁义。”<sup>[10](P491)</sup>赵岐说“仁义礼智,人皆有其端,怀之于内,非从外销铄我也。”<sup>[11](P2749)</sup>乃至北宋孙奭也说“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sup>[11](P2752)</sup>

第二,仁是人与人相互的爱。董仲舒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sup>[8](P138-139)</sup>这里董仲舒明确区分了爱他人与爱自己,认为仁者是爱他人之名,“仁者爱人,不在爱我”<sup>[8](P140)</sup>。刘向在《说苑》中说“季康子谓子游曰‘仁者爱人乎?’子游曰‘然。’‘人亦爱之乎?’子游曰‘然。’”<sup>[12](P43)</sup>刘向强调先要爱他人,而后得到他人的爱。与刘向不同,扬雄在《法言》中说:“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先求,然后人与之。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sup>[13](P38)</sup>强调先要自爱,而后得到他人的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从人从二。”<sup>[14](P161)</sup>郑玄更是注《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时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sup>[15](P1629)</sup>又注《礼记·表記》“仁者,人也”时说“‘人也’,谓施以人恩也。”<sup>[15](P1639)</sup>认为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敬相爱。

第三,仁是博爱。董仲舒说“何谓仁?仁者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谲之事,无辟违之

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事也。如此者谓之仁。”<sup>[8] [P143]</sup>董仲舒的爱人,是爱他人,在于与他人和睦相处,而这正是孔子所谓“泛爱众”。他还说“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sup>[8] [P176]</sup>这里董仲舒明确把“博爱”看作是仁爱的重要内容。他还说“仁者所以爱人类也。”<sup>[8] [P143]</sup>显然,董仲舒的仁爱就是爱人类,就是博爱。除了爱人,董仲舒还要求爱物。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sup>[8] [P139]</sup>自董仲舒讲博爱之后,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论语》“泛爱众”时说“云‘泛爱众’者,泛,广也。君子尊贤容众,故广爱一切也。”<sup>[16] [P7]</sup>他还说“人有博爱之德谓之仁。”<sup>[16] [P25]</sup>唐孔颖达疏《论语》“泛爱众”时说“‘泛爱众’者,泛者,宽博之语。君子尊贤而容众,或博爱众人也。”<sup>[17] [P2 458]</sup>后来,韩愈也明确提出“博爱之谓仁。”<sup>[18] [P172]</sup>

第四,仁即仁道、人道。董仲舒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sup>[8] [P90]</sup>韩婴则明确讲“仁道”,并且说:“仁道有四,谦为下。有圣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谦仁者。”<sup>[9] [P9]</sup>《论语·公冶长》载“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对此,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西汉孔安国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说“所以云不知者,范宁曰:仁道弘远,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无仁,非奖诱之教,故托云不知也。”<sup>[16] [P56-57]</sup>《论语·述而》载,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集解义疏》引苞氏曰“仁道不远,行之则是至也。”又说“世人不肯行仁,故孔子引之也,问言仁道远乎也,言其不远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即是,此非出自远也。”<sup>[16] [P98]</sup>《论语·述而》载,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魏何晏引东汉郑玄曰“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也。”北宋邢昺疏曰“曾子言子张容仪堂堂然盛,于仁道则薄,故难与并为仁矣。”<sup>[17] [P2 352]</sup>此外,汉儒又将仁解为人道。对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东汉赵岐注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北宋孙奭疏曰“孟子言为仁者,所以尽人道也,此仁者所

以为人也。盖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与人而言之,则人道尽矣。”<sup>[11] [P2 774]</sup>由此可见,汉儒将仁解为仁道、人道,影响之大。

应当说,汉唐诸儒对仁做了一些探讨。但是,以爱言仁,只是依据《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需要与《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相互参证;同时,以爱言仁,实际上是以人之情言仁,并不是孟子所言“仁,人心也”,需要对心及其与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在这些方面,汉唐诸儒是有欠缺的。换言之,他们只是较多关注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而对孟子又曰“仁,人心也”则没有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 二 以“性”与“情”言“仁”与“爱”

北宋二程对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多有阐释。程颢说“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之气粹然达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也。”<sup>[19] [P70]</sup>并以“与物同体”说仁,指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sup>[19] [P16]</sup>还说:“医书言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sup>[19] [P15]</sup>程颐则以心之性与情讲仁与爱的关系,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sup>[19] [P182]</sup>在程颐看来,汉唐诸儒误读了《孟子》“恻隐之心,仁也”,而“以爱为仁”。为此,他提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还说“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心是所主处,仁是就事言。”“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sup>[19] [P183-184]</sup>

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把仁与爱分割开来。杨时讲“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sup>[20] [P209]</sup>,并说:“世儒之论仁,不过乎博爱、自爱之类,孔子之言则异乎此,其告诸门人可谓详矣。然而犹曰‘罕言’者,盖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体未尝言故也。”<sup>[20] [P2]</sup>谢良佐则以“心有知觉”释仁说“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痺不知痛痒,谓之不仁。”<sup>[21] [P2]</sup>又说:

“世人说仁只管着爱上,怎生见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甚事?何故却近乎仁?”<sup>[21][P6]</sup>

朱熹年轻时从学于李侗,并对仁做过深入讨论。他说“仁是心之正理,能发能用底一个端绪,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气无不纯备,而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顷刻停息,愤盈发洩,触处贯通,体用相循,初无间断。”<sup>[22][P332]</sup>又说“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谓之仁。”<sup>[22][P336]</sup>

朱熹讲“仁是心之正理”,因而对“心”多有研究。他以《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为依据,以为心有未发、已发。他说:“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sup>[23][P94]</sup>在朱熹看来,心之未发,为体、为性;已发,为用、为情。心不等于性,性为心之体;心不等于情,情为心之用。然而,朱熹其实强调的是体用不可分。他说“未发者,其体也,已发者,其用也。……要之体用未尝相离。”<sup>[24][P1000]</sup>又说“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仁无不统,故恻隐无不通,此正是体用不相离之妙。”<sup>[25][P1830]</sup>所以,朱熹讲“心统性情”。他说:“‘性、情’字皆从‘心’,所以说‘心统性情’。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sup>[23][P96]</sup>又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统性情、该体用者,心也。”<sup>[25][P2660]</sup>就性为体、情为用而言,性与情、仁与爱互不相同,不可“以爱为仁”;就“心统性情”而言,性与情、仁与爱不相分离,统为一体。所以,朱熹赞同程颐所谓“爱自是情,仁自是性”,以“性”与“情”言“仁”与“爱”,既反对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反对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

按照朱熹的说法,心“统性情、该体用”,是性与情、仁与爱既互不相同又不相分离的统一体。朱熹还说“程子曰‘仁,性也;爱,情也。岂可便以爱为仁?’此正谓不可认情为性耳,非谓仁之性不发于爱之情,而爱之情不本于仁之性也。”<sup>[25][P1410]</sup>也就是说,仁是性,爱是情,性与情、仁与爱互不相同,因而

不可“以爱言仁”;同时,仁之性与爱之情不相分离,不可“离爱而言仁”。因此,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就性与情、仁与爱互不相同而言,仁是性、爱是情,这就是程颐所谓“爱自是情,仁自是性”。朱熹说“仁是性,恻隐是情,须从心上发出来。‘心,统性情者也。’”<sup>[23][P93]</sup>又说:“仁是性,恻隐是情。恻隐是仁发出来底端芽,如一个谷种相似,谷之生是性,发为萌芽是情。”<sup>[23][P1380]</sup>其二,就性与情、仁与爱不相分离、统为一体而言,仁既是性又发用为爱之情,爱既是情又本于仁之性,仁与爱不可分离。朱熹说“仁离爱不得。……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sup>[23][P119]</sup>又说“仁非爱,他却能爱。……爱非仁,爱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sup>[23][P474]</sup>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认为,讲“仁是性”与孟子讲“仁,人心也”相一致。他说“心者,兼体、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恻隐是情。’若孟子,便只说心。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孟子是兼体、用而言。”<sup>[23][P475-476]</sup>在朱熹看来,程颐讲“仁是性”,分别体用、性情、仁爱而言,与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兼心之体用、性情、仁爱而言,二者是一致的。

所以,朱熹既要反对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要反对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并且说:

由汉以来,以爱言仁之弊,正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为性尔。今欲矫其弊,反使“仁”字泛然无所归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谓矫枉过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将使学者终日言仁而实未尝识其名义,且又并与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sup>[25][P1412]</sup>

在朱熹看来,汉以来“以爱言仁”,其弊病在于“不察性、情之辨”,将性与情、仁与爱混为一谈;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将性与情、仁与爱分割开来,“遂至于不相管”,既不识仁,又不了解心与性情的关系。

与此同时,朱熹又强调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并不是“将心训仁”。他说:

孟子之言固是浑然,然人未尝无是心,而或至于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

然则“仁”字、“心”字亦须略有分别始得。

记得李先生说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将“心”训“仁”字,此说最有味。<sup>[25] [P1 841]</sup>

朱熹认为,仁与心略有分别,不可“将心训仁”。

据《朱子语类》载:

问“杨氏谓‘孟子言‘仁,人心也。’最为亲切。’窃谓以心之德为仁,则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缘人不识仁义,故语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训仁;义,只是人之所行者是也。”<sup>[23] [P1 406]</sup>

在朱熹看来,孟子讲“仁,人心也”,只是说仁只在人心,并非以人心训仁。朱熹还说“孟子之言,非以仁训心也,盖以仁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则有是德矣。”<sup>[24] [P721]</sup>又说“仁是无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会不得,便说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来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来指示仁也。”<sup>[23] [P1 405]</sup>在朱熹看来,仁并不等于人之心,只是自人之心而言仁。他还说“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这说心是合理说。如说‘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是心为主而不违乎理。”<sup>[23] [P84]</sup>也就是说,孟子所谓“仁,人心也”,是就合乎理之心而言,就心之本体,即性而言。

### 三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朱熹不仅以“性”与“情”言“仁”与“爱”,反对汉唐诸儒“以爱为仁”,以孟子所谓“仁,人心也”兼心之体用、性情、仁爱而言,反对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而且在《论语集注》中明确提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sup>[26] [P48]</sup>他还说“仁只是爱底道理,此所以为‘心之德。’”“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根。”<sup>[23] [P465]</sup>也就是说,仁是爱之理,是爱之根本。

在《论语集注》之前,朱熹曾撰《仁说》,言心与仁的关系。他指出: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

之,则曰仁而已矣。……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sup>[25] [P3 279-3 280]</sup>

这里明确提出人之心本于天地生物之心而为心之德,即为仁,同时又将《周易》乾卦“元亨利贞”四德对应于人之“仁义礼智”四德,并将统“元亨利贞”之“元”对应于包“仁义礼智”之“仁”,以“元”之运行而有春夏秋冬之序,对应于“仁”之生发而有“仁义礼智”之序,由此进一步讲“仁义礼智”四德之体分别发用为“爱恭宜别”之情,讲仁为体,爱为用。此外,朱熹还批评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并指出:“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sup>[25] [P3 280]</sup>显然,朱熹《仁说》已经包含了后来《论语集注》所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的思想。

关于仁何以为“爱之理”,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

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为心也,未发则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理也,而其发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而其发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而其发为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而其发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为妙也,仁之所以为爱之理,于此其可推矣。<sup>[24] [P612]</sup>

这里以五行配仁义礼智信,或出自郑玄注《中庸》“天命之谓性”曰“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sup>[10] [P1 625]</sup>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言“木神曰仁”“金神曰义”“火神曰礼”,与郑玄相一致,而朱熹言“水神曰智”“土神曰信”,则与郑玄“水神则信”

“土神则知”稍有不同<sup>①</sup>。

朱熹晚年解释“仁者,爱之理”时说:

这一句,只将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爱之理”,爱自仁出也。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sup>[23] [P464]</sup>

也就是说,朱熹通过分析心与性情的相互关系,以心为主宰,仁为性、为体,爱为发用、为情、为仁之端,并由此提出“仁者,爱之理”,既不同于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同于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

至于为什么既言仁为“爱之理”又言“心之德”,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

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尽也。程子论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推此而言,则可见矣。盖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恻隐之体也,而贯四端。故仁之为义,偏言之,则曰爱之理……专言之,则曰心之德……其实爱之理,所以为心之德。”<sup>[24] [P616]</sup>

程颐曾作《易传》注《易·乾·象》“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时曰“‘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sup>[27] [P697]</sup>在程颐看来,乾之“元亨利贞”四德中的“元”,如同“仁义礼智信”五常中的“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据此,朱熹也讲仁的“偏言”与“专言”。据《朱子语类》“杨方庚寅(1170年)所闻”,朱熹曾说过“其全体固是仁,所谓专言之也。又从而分,则亦有仁义分言之仁。”<sup>[23] [P119]</sup>后来,朱熹在《仁说》中讲仁包“仁义礼智”四德,而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并认为“偏言之,则曰爱之理”,“专言之,则曰心之德”。朱熹还说“‘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

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sup>[23] [P466]</sup>在朱熹看来,仁既可偏言又可专言;偏言之,仁是“仁义礼智”四德之一,仁是“爱之理”;专言之,仁包“仁义礼智”四德,仁是“心之德”。

朱熹认为,之所以既言仁为“爱之理”又言“心之德”,还在于《论语》中的“仁”既有就心之德而言,又有就爱之理而言。他说“圣贤言仁,有就‘心之德’说者,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之类;有就‘爱之理’说者,如‘孝弟为仁之本’之类。”<sup>[23] [P466]</sup>他又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论》《孟》中有专就‘心之德’上说者,如‘克己复礼’,‘承祭、见宾’,与答樊迟‘居处恭’,‘仁人心也’之类。有就‘爱之理’上说者,如‘孝弟为仁之本’,与‘爱人’,‘恻隐之心’之类。”<sup>[23] [P471]</sup>

当然,朱熹又讲“爱之理,所以为心之德”。他说“心之德即爱之理,非二物也。”<sup>[25] [P2396]</sup>据《朱子语类》载:

安卿问“‘心之德’,以专言‘爱之理’以偏言。”曰“固是。‘爱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别有个‘爱之理’。偏言、专言,亦不是两个仁。小处也只在在大里面。……仁只是一个仁,不是有一个大底仁,其中又有一个小底仁。”<sup>[23] [P467]</sup>

在朱熹看来,偏言讲仁是“爱之理”,专言讲仁是“心之德”,二者是一致的,“爱之理”,即是“心之德”。他还说:

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sup>[23] [P112]</sup>

朱熹特别强调仁是“心之德”,讲仁包“仁义礼智”四德,而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据《朱子语类》载:

或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曰:“‘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气上

<sup>①</sup>汉班固《汉书》曰“声者,宫、商、角、徵、羽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班固《汉书》卷21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7-958页)

看。如春夏秋冬,须看他四时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时。四时之气,温凉寒热,凉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气之长,秋是生气之敛,冬是生气之藏。若春无生物之意,后面三时都无了。此仁所以包得义礼智也,明道所以言义礼智皆仁也。”<sup>[23] (P467)</sup>

在朱熹看来,仁之所以既是“爱之理”又是“心之德”,是由于包得义礼智;而仁之所以包得义礼智,正如春包得三时在于春有生物之意。

关于朱熹讲仁之生意,据《朱子语类》“杨方庚寅(1170年)所闻”,朱熹说过“只从生意上说仁。”<sup>[23] (P119)</sup>后来,朱熹在《仁说》中将乾卦“元亨利贞”四德对应于人之“仁义礼智”四德,并将统“元亨利贞”之“元”对应于包“仁义礼智”之“仁”,以“元”之运行而有春夏秋冬之序,对应于“仁”之生发而有仁义礼智之序。由此可知,朱熹以“心之德”言仁,讲仁包“仁义礼智”四德,内涵仁的生发之意。后来,朱熹在解《周易》乾卦“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的关系时说: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更有义礼智!<sup>[23] (P1691)</sup>

在这里,朱熹通过讲述“元者生意”以及“元亨利贞”之生的次第,而阐发“仁本生意”以及“仁义礼智”之生的次第。

朱熹晚年还说:

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sup>[23] (P107)</sup>

又说:

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

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sup>[25] (P3589)</sup>

应当说,朱熹言仁为“爱之理”,是在心与性情的相互关系上,讲仁为性、为体,爱为发用、为情;而又言仁为“心之德”,则是讲仁包四德,讲仁之生意。

朱熹《论语集注》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提出“仁者,人心之全德。”<sup>[24] (P104)</sup>“仁者,本心之全德。”<sup>[26] (P133)</sup>朱熹门人徐居甫把“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与“仁者,本心之全德”合而言之,说“心之德以专言,爱之理以偏言。专言之本则发为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则合于专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于气禀、蔽于私欲,则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贯通。……人能有以体乎仁,必其无一毫之私得以间其生生之体,使之流行贯注,无有不达、无有不偏,然后为能全其心之德、爱之理也。”<sup>[25] (P2788)</sup>对此,朱熹除不同意将“爱之理”以用言,完全赞同所谓“人能有以体乎仁”,“然后为能全其心之德、爱之理”的说法。换言之,在朱熹看来,无论是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还是讲“仁者,人心之全德”,都是强调仁之在心,求仁于心。朱熹在《仁说》中解《论语》“仁”时指出:

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逃、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sup>[25] (P3280)</sup>

显然,朱熹不仅讲仁之在心,求仁于心,讲仁为性、为体,而且又讲仁发用于爱,讲仁包四德,讲仁之生意,讲爱人利物。由此可见,朱熹所谓“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

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

#### 四 余论

朱熹言“仁”,兼体用、性情、仁爱、内外于一体,又包四德而贯四端,对后世影响很大。戴侗《六书故》以心言仁,说“夫人有是身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德。有是身而疾痛苛痒之弗知者,肌肉不仁也;有是心而仁义礼知之弗身者,其心不仁也。尽其心,践其形,肫肫兮其若赤子之肌,仁义礼智切于心,犹疾痛苛痒之切于身也。然后能诚诸身,能诚诸身然后能人其人,能人其人斯谓之仁矣。夫心生物也,仁生德也;于四时为春,于四德为元,天地之大德也;而人得之以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万物,人之体也;亲疏远迩虽有衰序,疾痛苛痒无不周通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始于邦家,终于四海者,仁之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者,仁之方也’,故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sup>[28] [P151-152]</sup>既讲“仁义礼智切于心”,又讲“仁之充”,讲仁之发用。

清儒之言仁,既有发挥汉唐诸儒“以爱为仁”者,又有持朱熹的观点,以体用言仁爱,而批评“以爱为仁”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而言“‘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作了解释,说“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sup>[29] [P365]</sup>阮元撰《〈论语〉论仁论》,说“诠释‘仁’字,不必烦称远引,但举《曾子·制言篇》‘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数语足以明之矣。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sup>[30] [P176]</sup>刘宝楠《论语正义》赞同

阮元的说法,并且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仁’字本训。《说文》‘仁’字从二人,会意,言己与人相亲爱也。”<sup>[31] [P7-8]</sup>显然是发挥了汉唐诸儒“以爱为仁”。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不仅讲《中庸》“仁者,人也”,而且还说“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谓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谓仁乃是人之所以为心也。与《中庸》语意皆不同。”<sup>[29] [P365]</sup>方东树《汉学商兑》针对阮元以相人偶言仁,指出“以人偶论仁之用,则可;以人偶论仁之体,则不可。……程子曰‘言仁离不得爱’,而便以爱为仁,则不可;‘仁者必爱’,指爱为仁,则不可。此语甚明。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此六字,发明程子意最详尽。盖程子所谓‘爱非仁’,以仁之发而名仁者也,即朱子所谓‘爱之理’也。”<sup>[32] [P71-72]</sup>至于《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方东树说“《中庸》语意,本甚明白。郑氏注‘相人偶’是解下‘人’字,非解上‘仁’字,若曰此泛言仁者,人之所以为人,犹今世俗所称‘相人偶’云尔。郑意为‘亲亲’作引,故曰‘以人意相存问之言’。语本无病。汉学者获此三字异闻,喜心翻倒,不暇详思,遽以‘相人偶’讲仁,是隔一层。”<sup>[32] [P72]</sup>夏忻则批评阮元《〈论语〉论仁论》,说“郑氏实未尝以‘相人偶’训仁也。兹姑不具论,果如此书之说‘必有二人而仁乃见’,则‘颜子三月不违仁’,是颜子之心三月不违于相人偶矣;‘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是无终食之间不相人偶也;‘造次、颠沛必于是’,是造次、颠沛必相人偶矣;‘求仁而得仁’,是求相人偶而即得之;‘杀身以成仁’,是杀身以成人偶也。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sup>[33] [P101]</sup>

康有为以孟子“不忍人之心”言“仁”。他的《论语注》说“孔子之言道,曰仁与不仁,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推至天地位,万物育,其本亦不过尽己心而为忠,推己心而为恕耳。”<sup>[34] [P52]</sup>他还说:“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



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由此出。”<sup>[35] [P9]</sup>又说“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虽有内外体用之殊,其为道则一,亦曰仁而已矣。夫仁者,相人偶之谓。……凡人之情,见有同貌同形同声者,必有相爱之心,故《中庸》曰‘仁者人也。’”<sup>[35] [P10]</sup>显然,康有为以内外、体用而言“仁”,与朱熹是一致的。

应当说,孔子言“仁”与“爱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非仅限于“爱人”。孔子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显然,仁之根本在于心。孟子不仅讲“仁也者,人也”,而且讲“仁,人心也”;还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由此可见,孟子对于“仁”的解读,已非仅限于“仁者爱人”,讲仁是人道,而且还讲仁根于心。

现代对于孔子言“仁”的解读,虽已非仅限于“爱人”而言,大都以“全德”或“人道”“人格”界定“仁”,但是,这样的解读,往往仍然局限于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而很少与内在心性统为一体,以内在心性言“仁”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郭店楚简研究发现,竹简中多次出现从心从身的“𠄎”字,而被识读为“仁”字。比如,《六德》云“此可(何)胃(谓)六惠(德)?圣、智也,𠄎(仁)、宜(义)也,忠、信也。”<sup>[36] [P1]</sup>《性自命出》云:“宜(义),敬之方也。敬,勿(物)之即也。(筮),𠄎(仁)之方也。𠄎(仁),管(性)之方也。”<sup>[37] [P39]</sup>许慎《说文解字》解“仁”,不仅说“仁,亲也,从人从二”,还说“𠄎,古文仁,从千、心。”<sup>[14] [P161]</sup>对此,戴侗在《六书故》中说“𠄎,古文从心,千声。”<sup>[28] [P151]</sup>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说“从心,千声也。”<sup>[29] [P365]</sup>从字形上看,“𠄎”与“忞”都与“心”有关联,似与孟子所言“仁,人心也”相关。

朱熹对“仁”的解读,将孟子所言“仁也者,人也”与“仁,人心也”结合起来,以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就纵向而言,仁根于心,仁由心而发,由内而发用于外,由仁之性而发用于爱之情;就横向而言,仁统摄诸德,涵括“仁、义、礼、智”四德。这一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又包四德而贯四端的

解读,与孔孟言“仁”是一致的,并非如阮元所说“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人所谓之仁”。应当说,朱熹言“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对于今天解读孔子的“仁”,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而将二者分别开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参考文献:

- [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三松堂全集:第8卷.修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5]熊十力.体用论[M]//熊十力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6]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论语大义:第2卷[M]//马一浮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1996.
- [7]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8]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9]韩婴.韩诗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刘向.说苑·贵德: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扬雄.法言·君子篇:卷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5]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6]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8]韩愈.韩昌黎全集·原道:卷11[M].上海:世界书局,1935.
- [1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0]杨时.龟山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1]谢良佐.上蔡语录[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外编(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2]朱熹.延平答问[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23]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朱熹.四书或问[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2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27]程颐.周易程氏传:卷1[M]//二程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8]戴侗.六书故:卷8[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书店,1992.
- [30]阮元.《论语》论仁论[M]//擘经室集:一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3.
- [3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2]方东树.汉学商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33]夏炘.述朱质疑:卷10[M]//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34]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5]康有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6]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六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3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From Kong Meng's "The benevolent loves others" to Zhu Xi's "Benevolence is the principle of love and the virtue of heart"

LE Ai-guo

(School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to Confucius's "benevolence" Zhu Xi plays Meng Zi's words "benevolence and human heart", and thinks that "benevolence" i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benevolence and send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being used to love from inside to outside, with nature, body use, benevolenc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 a result, "benevolence" is "the reason of love". At the same time, benevolence has "business" and the four end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ompassion, shame, rhetoric, and quarrel", and therefore the "virtue of heart", "the whole virtue of the heart", "the full virtue of the heart". Compared to today'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s "benevolence", or taking "benevolence" as the external morality, or taking "benevolence" as the inner heart, Zhu Xi defines "benevolence" as "love and heart". It still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Confucius; Meng Zi; Zhu Xi; benevolence; love reason; heart virtue

(责任编辑 王能昌)